# 抗美援朝对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影响——纪念抗美援朝运动70周年

1. 对抗美援朝的介绍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又称抗美援朝运动或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仅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阶段，也包括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10月25日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历史背景

朝鲜半岛的分裂

金日成欲武力统一朝鲜

朝鲜人民军的南进与美国的干涉

美军越过三八线、威胁中国安全

战争过程

1. 二次战役→第三、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苏联秘密介入→第一次停战谈判→军事分界线协议→双方僵持→正式停战
2. 对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影响

对军事建设：

1.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表现形态。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性战争。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联合国军”与南朝鲜军为战争的一方，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以及苏联秘密出动的空军为战争的另一方。但是,这场战争又具有 明显的局部性。除了美国一些好战分子极力主张扩大战争外，战争双方皆力争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并且，到了战争后期。双方作战的目标、使用的作战手段。也都力争控制在一 定的限度以内。美国拥有核武器，也曾密谋使用核武器，但慑于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意志、世界舆论的压力和害怕苏联核报复，因而未敢使用。这一切，都使朝鲜战争成为战后最典型的“有限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参战国的国际性与战争的局部性，以及战略目的和手段的有限性，是这场战争区别 于以往战争的重要特点,表明人类战争在表现形态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人类有可能避免更具灾难性的世界性战争或核战争。

另一方面，从战争与和平的辩证转化关系来看。这场战争也促使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更充分认识到中 国捍卫自身战略利益的决心和力量，认识到和则两利、战则俱损的现实，认识到少做有损于中国正当利益 、不利于两国和平相处的事情的重要性。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军每次对外使用武力，都只限于制止他 国对我领土或邻邦的侵略，作战的直接目标也总是设定为在有利态势下求得和平。其中的一条历史经验就 是：打是为了和，打得好才能和，打不好不能和，打过了头影响和。这在后来抗美援越战争中得到了很好 的验证。当时，为避免中美开战，我军通过宣言和外交途径一再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美国政府则吸取了朝鲜战争中越过三八线的教训，其地面部队始终未越过北纬17度线。

2.与此同时，这场战争也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遇：我军不仅在战争中积累了打赢现代 局部战争的丰富经验，而且在装备建设上也实现了很大的跨跃。战争时期，苏联援助我军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装备，都是当时世界次先进水平，使我军首次实现了武器标准化。1955年，苏军撤离旅大、丹东，又有偿移交了记账款10亿人民币的装备。上述装备，折合人民币30亿元，按当时比价换成美元为13亿 ，对我军装备水平的发展和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苏联又援建156项重点工程，其中三分之一是军工企业，而且从飞机、坦克、火炮到步兵武器都是全部配套的，并保证所有零配件国内都能生产。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时，差不多全部常规装备，我国都已经能够自己生产了。可以说，正是

在上述工业的基础上，1955年中央决心搞核武器，1964年就试验成功原子弹，1966年试验成功中程导弹核武器，1967年试验成功氢弹，1968年就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

3.从地缘战略角度讲，抗美援朝保证和维护了我国地缘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意义重大。

美援朝期间，当战局开始不利于美国时，美在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同时，麦克阿瑟还曾解除对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的禁令，蒋介石也制定了以20至30万兵力攻取上海的计划。这样，一旦美军攻到鸭绿江边并长期驻军，必将助长台湾当局的嚣张气焰，就有可能出现蒋军在美军呼应或侧应下攻打大陆的情况。届时，我军侧后将有极大的隐患，将面临美蒋军队两面夹击的危险。可以说，正是因为当年抗美援朝打出了国 威、军威，我国又取得了地缘战略上的主动，美国才不敢小视我们，不敢对我轻举妄动，我们也可以更有 力地以任何必要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对文化建设：

1、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对人民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通过动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国家利益等思想和观念深入广大人民心中，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个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应尽的义务和自身的价值，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打下了基础。总而言之，战争激发了国内民众的政治热情，提升了中共在人民心中的威信，推动了思想层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避免了因战争激发的社会矛盾，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思想上

结合国际和国内的历史背景，对志愿军进行的国际主义教育，使志愿军认识到抗美援朝是正义的行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对群众开展以“三视”（仇视、鄙视、蔑视）为中心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有力地清除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给部分中国人所造成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对战俘进行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为中心内容的教育，使战俘认识到朝鲜战争的性质、认识到志愿军是正义之师，因而积极响应志愿军的号召，参加和平反战的宣传（选自知网杜明杰《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军也开设了多种多样的战地文化工作，有利于军队的现代化转型。

政策有力支撑,上级人文关怀,促成了战地文化工作的重心前移志愿军赴朝参战前夕,针对一些部队官兵开始参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却受限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难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开始把提高部队官兵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落实。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志愿军部队经历了短暂的运动战后,长期坚守阵地,战斗频繁,生活艰苦,改善精神文化生活,发扬部队克服困难的精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持部队持续的战斗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志愿军各级首长注重深入基层,调查连队文化生活,做到层层检查,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同时,结合朝鲜战场文化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志愿军总部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战地文化政策方针的制订。

3. 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在战争期间也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作品激发人民爱国激情：。

战斗在前线的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在战斗的问隙，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为基础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歌曲《志愿军战歌》、《来一个歼敌大竞赛》，说唱《侦察英雄韩启发》、《阵地之家》，小说《突破临津江》，剧本《创造》等。志愿军官兵在上级文化政策的关怀下，充分挖掘自身文化资源，总结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战地文化工作方法，这些做法在鼓舞官兵士气，激发战斗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丰富了国家的文化底蕴。

**抗美援朝街头诗——战争诗歌的鼓动性：**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文学写作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持久”的，鼓动人们勇敢斗争、打败敌人，激发人们保家卫国的热情。作者告诫走向新社会的青年人们，听到炮声后“不要光知道幸福/不知道仇恨”(《你》)，面对敌人，“可怕的/是我们的枪连同自己的思想/长满了红锈!” 这在战争时期对于让人民大众了解战争真相、认识战争形势、激发人民大众的战斗热情与爱国热情，无疑起着很好的作用；

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作家魏巍历时20年呕心沥血之作——长篇小说《长空怒风》表现了抗战前线的志愿军英勇奋战及其与朝鲜人民的友谊，也表现了国内广大人民，尤其是志愿军家属积极响应志愿军作战的热情以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以上选自知网张自春《魏巍的“抗美援朝”创作》）

4.激发了自上而下、广泛普及的群众性，提高了国家凝聚力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鼓舞我军士气的歌曲。如《打，狠狠地打》、《抗美援朝进行曲》、《中国援朝志愿军之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前进！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英雄的阵地，钢的山》、《进军号》、《我们是保卫和平的战斗员》、《志愿军战士之歌》、《来一个歼敌大竞赛》等歌曲等。这些内容积极的文化口号和文艺作品从正面表扬了英模，塑造了英雄形象，鼓舞了部队斗志。群策累力的战地文化工作，成功地将我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灌输于官兵头脑，启发了部队官兵的荣誉心理，不仅在当时极大地增强了人员作战信心，也提升了当今人们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提高民族的凝聚力。

5. 文化在军事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军的先进军事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证我军性质的政治导向功能、促进我军战斗力提高的强军功能、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育人功能和发挥我军制度、纪律优势的规范功能。发展我军特色的军事文化，要以对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为主题，以坚定理想信念、激发战斗精神为目标，以提高军事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为着力点，以宣传教育和群众性文化艺术体育活动为载体，全面推进，

全面发展。

**杰出人物：**

1. 杨根思(1922--1950)江苏泰兴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多次立功受奖，曾两次被评为战斗模范，荣获“爆破大王”、“华东一抗美援朝级人民英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等称号，并光荣地出席了1950年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同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担任志愿军第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 在1950年11月29日第二次战役中，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战士，坚守在长津湖地区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小高岭，这是敌人南逃的必经之地。战斗打响后，他率领全排先后连续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8次疯狂进攻。此时，阵地上只剩下他与两名伤员，并且弹药用尽。当美军发起第9次进攻时，危急关头杨根思抱起最后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毅然冲入敌群，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人退路的阻击任务。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将他生前所在连命名为“杨根思连”。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朝鲜政府还在他牺牲的地方建立了“杨根思英雄纪念碑”。
2. 黄继光(1930年--1952年)原名黄积广，四川中江县人。1949年参加革命，1951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2营通信员、代理班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和上甘岭战役。由于多次出色完成任务，他两次被评为工作模范并荣立三等功。 在1952年10月19日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所在的营奉命再次反击597.9高地。当连续攻下敌人数处阵地后，部队在零号阵地半山腰被敌机枪火力点压制，前进受阻。危急中，他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爆破任务。他勇敢地冲向敌地堡，用手雷炸毁敌几个火力点后，敌一残存的火力点还在顽抗，部队前进依然困难。此时，黄继光身上已经7处负伤，手雷也已全部用光。为了完成任务，减少战友的伤亡，他忍住巨痛英勇地扑向敌人的火力点，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正在扫射的敌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扫清了前进的道路。在黄继光壮烈献身精神的鼓舞下，反击部队迅速全歼美7师5个连，夺回阵地。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青年团中央授予他“模范青年团员”称号。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为缅怀英雄，他的名字及英雄事迹被镌刻在上甘岭北面的五圣山石壁上，其家乡中江县兴发乡也改名为继光乡。
3. 许家朋(1931-1953)安徽省绩溪县人，1951年5月参加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志愿军第23军第67师第200团第9连战士。 1953年7月6日夜，在反击石砚洞北山战斗中，他所在的突击排突入敌阵地后，为敌暗堡猛烈的机枪火力所阻，爆破手爆破未成，英勇牺牲。许家朋从牺牲的爆破手身边拿起炸药包向敌暗堡扑去，在距敌10余米处两腿负伤，就夹着炸药包爬行。在逼近敌暗堡后，发现炸药包受潮失效，他猛然挺立起来，扑向敌碉堡机枪眼，双手紧抱敌机枪脚，胸膛紧抵枪口，整个上身都钻进了枪眼，阻止了敌人机枪发射，保证了攻击部队迅速攻占主峰，全歼守故100余人。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4. 张桃芳(1931-2007)江苏兴化人。22岁的年轻战士，志愿军214团8连狙击手张桃芳，就是他在金化郡上甘岭狙击战中，用442发子弹，歼敌214名，创造了朝鲜前线我军冷枪杀敌的最高记录。 1954年，24军选拔战斗英雄支援空军飞行员队伍建设，经过体检，214团仅张桃芳一人合格，进入徐州第5航空预备学校和济南空军第5航校1团学习。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空军高密第1训练基地担任歼击机飞行员，飞行米格15和米格15比斯歼击机，但在随后换装新式歼击机后，身体不适应高空缺氧，由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批示，转到防空兵，任防空兵某部营长，后来历任坊基地警卫连副指导员、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员、山东潍县基地警卫连指导员、济空地空导弹第九团司令部副参谋长、地空导弹九团副团长等职务。 1985年6月，张桃芳退职休养。

对国内经济：

“过去十四个月的事实证明, 抗美援朝不但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 而且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动力。同我们的敌人所预料的相反, 这个斗争不是推迟了而是加速了我们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建设的准备工作的进行。” 1952年12月11日, 周恩来指出, 我们的经济恢复工作, 不论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的生产和业务所达到的水平, 一般都超过了抗战以前最高年代的水平, 只有极少数的还需要继续努力。这种恢复, 就给了我们一种条件, 使我们可以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又可以进行国家的建设。抗美援朝的适度军事开支，增加了工业产品的订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增长，同时战争的胜利也大大增强了国民的信心，稳定了国内形势，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复苏。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 国民经济恢复的顺利完成, 使新中国度过了一个最困难的时期, 新中国的建设取得了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 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准备了条件。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体现在战场上, 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使新中国得以按预定计划从1953年起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目标是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外交（美国，苏联）与对台：

对台：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直接插手台湾问题，由此形成了两岸长期对峙的局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

第一，两岸关系陷于长期对峙，并由国内问题向国际问题演进。二战结束后，形成了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对美国不抱任何幻想，却仍然希望和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的当天，周恩来外长就发出了希望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函，这一公函也送到了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美国政府的反应是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对此新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1950 年 2 月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至此中苏同盟和中美在远东对立格局初步形成。朝鲜战争，中美两国兵戎相见，最终使朝鲜恢复到战前的北南对峙局面。这场战争，既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又沉重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嚣张气焰，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也不向过去那样轻视中国。停战以后美国加大了对国民党援助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敌视。在这种形势下，国共双方开始调整各自的政策：国民党在美国的保护下，抓住美国援助的有利时机，通过“改造”国民党和实行土地改革等项措施，大力发展经济，逐步在台湾站稳脚跟，增强了抗衡大陆的实力。从新中国来讲，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确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就

为中共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和平解决印度支那协议也已签定，整个远东地区趋于缓和，这也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以其它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在 1955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同时不承担不用非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承诺，标志着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总之，朝鲜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使得国共双方单存依靠军事力量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大。根据形势变化，国共两党开始调整各自政策，两岸关系进入长期隔海对峙局面。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步稳定下来，并抓住 70年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契机，大力发展台湾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成为世界有影响的地区之一。台湾与世界多数国家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和政治关系，特别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更为密切。这就使得台湾问题由单纯的国内问题，开始向国际问题演进。

第二，由于美国干涉，台湾问题日趋复杂。朝鲜战争结束后, 美国对台政策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即支持国民党反共的同时又极力避免卷入其中,其核心就是保持台湾与大陆的分离。为此美国一方面承诺保护台湾,向国民党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极力限制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挑衅，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明确规定台湾对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需先争得美国许可。显而易见，美国是想隔绝台湾和大陆的联系，保证美国对台湾的永久控制，使台湾成为美国牵制大陆﹑遏制中国崛起的一张王牌，其实质上就是在制造“两个中国”。从 1954 年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中美建交后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提高对台军售数量和质量，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等，都是美国推行两岸分离政策的自然延伸。美国的干涉成为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外部障碍。第三，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取得一致，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这就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美国确保台湾实质上就是在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国共双方均坚决反对。国民党把台湾看成是反攻大陆、重新复国的基地，反对把台湾和大陆分隔开，反对美国提出的从金门、马岛撤军，由联合国安排停火的建议，蒋介石明确表示：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人是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而“两个中国”更是“荒谬绝伦”，“中华民国领土绝对不允许割裂”。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两岸关

系，如停止炮击金门、裁减军队人数、发出和谈呼吁、支持台胞投资、力促两岸“三通”等，为和平解决台湾创造机会。特别是 2009 年 4 月 12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出席博鳌亚洲论

坛的国民党代表萧万长进行了会晤。胡锦涛提出双方要“抓住难得的机遇, 共同应对挑战, 切实加强合作, 努力共创双赢”,萧万长提出双方要“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为两党可能的第三次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两岸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双方和则两利，斗则两败。近年来，大陆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特别是大陆宽松的政治环境，优惠的投资政策，广阔的劳动力市场，已吸引越来越多的台胞来大陆投资办厂，两岸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尽管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极力回避“一个中国”，采取“更换国名”、购买先进武器、“入联公投”等手段，破坏两岸关系。但是随着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以及两岸经济和人员往来的密切，一个中国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绝不会因为政党的更迭而改变。综上所述，朝鲜战争给两岸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此为转折，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历史时期。

对美：

中美两国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杜鲁门政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在全中国的胜利不可避免，一改之前扶蒋反共的政策，逐渐表明自己要摆脱中国内战，与新中国政府交好的立场。

同时，美国也在为放手台湾承认新中国做舆论准备。这一时期的主流媒体也主张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政府。

视线转回国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便有意与美国接近，希望与其建立友好关系。

在1949年4月下旬，苏联人已经开始称赞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来临的胜利。但是在6月15日，毛又更清楚地表示了他对美国的和解政策。

然而，同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毛提出了“倒向苏联”的政策，断然背离了他早些时候的暗示，排除了走南斯拉夫道路的可能性。

对美态度的大转变，其实是在意识形态对立，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苏联援助，和美国客观上孤立中国以及苏联客观上与中国交好等条件下的唯一选择。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在朝鲜战争之前，在对亚洲总的政策的推行上，华盛顿是谨慎地避免触怒北京。与此同时，新中国也绝不希望与美国反目成仇。朝鲜战争的来临把这一切全改变了。

基于美国的安全与利益，美国政府决定采取强硬态度，改变之前在亚洲收缩力量的战略方针。美军入侵朝鲜，进入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中国东北和东南两个地区的安全。面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给予朝鲜道义上的支持，中美矛盾激化。

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它使得双方相互猜疑，更加疏远，造成两国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经过朝鲜战争，新中国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彻底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美国对中国的孤立政策被系统化和固定化。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来的鲜明的反美立场和强大战斗力使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是比苏联更具冒险性的敌人。

从此在美国，一切跟共产主义中国有关的人都要受到审查，一切偏袒中国的言论都会受到攻击，甚至连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会受到迫害。美国从此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遏制中国。

影响：

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反美态度**。

在出兵朝鲜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在国内掀起了轰轰烈 烈的肃清亲美、崇美、 恐美思想的运动，大规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不及从容地确立一个均衡而全面的外交战略**，便被匆忙地卷入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在外交层面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不理性的，一场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直接对抗，只能导致双方的彻底决裂，中国的大门从此对西方国家关闭。

20世纪70年代，出于各自的全球战略利益，中美关系发生缓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不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又对华发动了贸易战。

抗美援朝的发生是因为美国军队打到了鸭绿江边，今天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也在冲击中国的核心利益线。抗美援朝给中国造成了损失，但它迫使美方在三八线上最终签字，重创了华盛顿的战略傲慢，赢得了之后很多年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战略尊重。今天，美军飞机大炮对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也更应该有信心，拿出抗美援朝的底气，坚决打垮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进攻。

对苏：

1. 朝鲜战争暴露了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 的猜疑仍然存在
2. 朝鲜战争暴露了中苏双方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
3. 朝鲜战争埋下了苏中之间控制与反控 制斗争的伏线
4. 结论: 从朝鲜战争看中苏大论战的起源 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不期而 遇的,但却意外承担了责任。中国领导人对斯 大林在战争爆发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极为不 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隐忍未发。这种不 满为日后中苏双方的龃龉埋下了隐患。中国参 战后,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中朝苏 三方的密切配合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毕竟三者 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并不完全重合,因此也就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引起不同 程度的误解、矛盾与摩擦。虽然这些误解、矛盾 与摩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影响相互间 的真诚合作,但也结下了若干长期未能解开的 历史疙瘩。中苏关系越紧张,这些历史纠葛所 留下的阴影便会显得越浓重。及至中苏大论战 爆发,因这些纠葛所埋伏下的隐患便完全爆发 出来了。朝鲜战争强化了中苏同盟关系,苏联 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对苏联的政治经济 军事技术等方面的依赖程度也大大提高了。但 战争也打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 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尤其是东亚问题上的分 量,这在客观上又增强了中国对苏联的独立性。 中国独立性的增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苏联的恐 惧与猜疑。这种恐惧与猜疑的直接后果便是它 必然会导致苏联有意无意地抑制中国这种独立

性的发展。这就埋下了此后双方发生碰撞的更 为深层的隐线: 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控制 与反控制的斗争。而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则是引发后来中苏大论战的直接原因之一。